

“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篡改

(内部资料 供批判用)

普 麟

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批判组

一九七七年三月

说 明

我们最近从报刊和内部材料中摘编了这份资料，供批判“四人帮”之用。由于时间仓促，掌握的材料有限，这份资料肯定有不完整，甚至不妥之处，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

— 編 者

一、攻击和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公然反对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胡说“这些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都看，不可能，也不需要。”

转引自国家出版局：《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缅怀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光明日报》1977年1月7日

1969年张春桥恶毒攻击说：“《论十大关系》完全是苏联的一套，无非是企业管理，物质刺激。”

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的交代揭发

责任在于我，没把问题讲清楚，也讲不清楚。建议这个班子的同志先读毛选一至四卷，学习毛主席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我最近也在重读，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张春桥1976年6月12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语。

1975年“四人帮”的一个亲信从北京匆匆窜来上海，他胡说什么：

“列宁仅仅说过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春桥在写这篇文章（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时候，认为列宁的说法不够，他认为只有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怕大家看了，会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没有把这句话写上”。

“张春桥那样明确地从‘四个一切’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第一次，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

“在张春桥这篇文章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地阐述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列宁讲到了这一点，但在前面还加了许多限制词，也没有象春桥讲得那么明确。”

转引自方兆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面黑旗》，《文汇报》1977年2月14日

江青公然叫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适用了”。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理论组：《“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光明日报》1976年12月8日

1975年初，江青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恶狠狠地攻击说：“马、恩、列宁、主席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性，个别的局限性。”

转引自郑杭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容篡改——剖析“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若干例》，《北京日报》1977年2月25日

在编写中一政治教材《社会发展简史》时，我们有的同志曾提出要多写一些社会主义部分，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却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是写不出什么的，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也只是提了基本路线，其他没有什么。谁说社会主义要多写，就叫谁去写！”甚至恶毒地说：“不这样看，就是乌托邦。”

摘自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狠批“四人帮”利用教材反党的滔天罪行》，《文汇报》1977年2月4日

政治教材《社会发展简史》中曾引用了毛主席论述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四人帮”的那个余党竟恶狠狠地说：“这一段去掉。这话说得太绝对。‘最进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进步了吗？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是什么社会，谁也说不清楚。”结果把这一论述一刀砍掉。

摘自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狠批“四人帮”利用教材反党的滔天罪行》，《文汇报》1977年2月4日

二、篡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

(一) 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作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次谈话

有一些实在不象党员，但没有时间搞掉他，这次运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要相当大部分改造，有的是重建。解放后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次，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

张春桥1968年1月15日在华东师大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说：“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要搞一个巴黎公社，彻底砸烂‘旧机器’”。

转引自1976年11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揭发材料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同林彪一伙，诬蔑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家机构是“旧政府”，别有用心地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说成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发出了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狂吠。

转引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批判组：《“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激起天怒人怨》，《人民日报》1977年1月7日

张春桥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别有用心地制造了一个只能依靠所谓的工人阶级“左派”的谬论。

转引自第五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打击工人阶级就是打击革命》，《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9日

1957年12月，我们党在文艺界粉碎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翻案活动，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之后，姚文元写了《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黑文，……公开鼓吹说：“这一次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可以说是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路线的最后的终结”。

转引自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解胜文：《批判姚文元的阶级斗争“终结”论》，《人民日报》

1977年1月16日

1974年，有一次朱永嘉在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洋洋得意地介绍他所谓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他说，现在工人队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解放前的老工人，旧社会受过苦，解放后翻了身，工资比较高，因为过去自己受过苦，总想让自己的子女生活过得好一些，宠爱子女，因而犯错误的青年大多是这些人的子女；第二类是解放初期到57年进厂的工人，经过三反五反，特别是整风反右，他们把党委当作党的化身，所以这些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是保守派；第三类是58以后进厂的工人，经过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批工人革命冲劲很足，只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朱永嘉的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分析，是同毛主席的论述相对抗，污蔑广大工人群众，并为王洪文之流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摘自《朱永嘉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

（二）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

指示，把革命的老干部诬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所说的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成是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且说：这个资产阶级是由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所谓民主派组成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一个规律。……

“四人帮”一再叫嚣：“走资派还在走，是一层人”，“要解决一层人的问题”。什么叫“一层人”呢？反革命文痞姚文元作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他说：“关于一层人的问题，可以讲。但见文字还是要提一个阶级”。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说得更加露骨：“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认为，这里讲的资产阶级指的是阶级的整体。”

转引自向群：《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

1976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向他的一个心腹而授机宜说：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

转引自公安部大批判组：《绝不允许倒转无产阶级专政矛头》，《人民日报》1977年1月3日

【按】王洪文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指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

“四人帮”把浙江干部说成漆黑一团，王洪文说：“浙江干部老话多”，“多数是右的”，张春桥说：“浙江干部百分之七八十是右的。”他们还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走到走资派”，这是“一般的规律”。

摘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简报》浙江省（2）

（1976年12月14日）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个人谈体会的方式，传达了江青、张春桥的黑指示，……“走资派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

转引自文化部批判组：《“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

今年六月二日，毛远新再次向省委传了一大堆反革命黑话，……他还狂喊：“最大的障碍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在中央，二类老爷在省委，三类老爷在市”，“斗争方向明了，应该敢碰了，党内资产阶级掌权怎么能行呢？”

摘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简报》辽宁省

（1976年12月15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公开叫喊，斗争的重点“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

转引自沈阳部队司令部理论组：《不许篡改走资派的阶级内容》，《解放军报》1976年12月26日

徐景贤说：“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为走资派，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我矛盾。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即一些老同志，不少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部分人占了很大的比重。”

摘自《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

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别有用心地抬高青年干部，挑拨新老干部不和，挑动青年干部斗老干部。……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新干部就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老干部就是旧生产关系的代表”。

转引自中共彰武县委大批判组：《炮制“哈尔滨经验”的险恶用心》，《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9日

(三) 用所谓儒家与法家、新干部与老干部等

矛盾来篡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四人帮”篡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鼓吹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法家和儒家的矛盾”，“革命力量和复辟势力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这一派和那一派的矛盾”等等。

转引自《中共浙江省委陈作霖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北京日报》1976年12月18日

他们胡说什么“走资派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鼓吹只要“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正确。

转引自龙一文：《让大寨红花开遍巴山蜀水——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四川日报》1976年12月10日

三、歪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 否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在生产关系其他两个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

【按】姚文元在这里讲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但他只谈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发展生产力，建立必要的物质基础，却一字不提。

毛远新授意召开的全省理论讨论会，胡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决定性的”。

摘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简报》第十期

《论总纲》为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引证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时，只引了前半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段话的后半部被他们拦腰

砍掉了。砍掉的部分是：“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主席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革命，只有变革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论总纲》的炮制者故意回避毛主席的这些教导，……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梁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标本》，《光明日报》1976年10月7日

【按】这里所引的毛主席语录的前半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引文到这里为止，根本不存在什么“拦腰砍掉”的问题。梁效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目的是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我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现在是五个县、十个公社、十一个大队，今年秋后可否做到每个县都有试点单位？可否有几个公社全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社、穷队，穷社的想法如何，值得关心，不要两只眼睛老是看着富社富队。

张春桥1976年6月5日的一个批语

张春桥和一小撮党鼓吹“无条件过渡论”，说什么“不够条件不能说不可以过渡”。……可能这种“无条件过渡”实在是太露骨了，他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竟然又胡扯起什么“过渡”的“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穷队要靠“穷精神过渡”。

转引自方兆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面黑旗》，《文汇报》1977年2月14日

1976年6月张春桥那个关于“过渡问题”的黑批示下达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党立即紧紧跟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束搏了生产力的发展”啦，“不管穷队、富队都有过渡的要求和愿望”啦，“有疑难杂症的也可过渡”啦，“过渡”问题已是“大势所趋”啦，奇谈怪论，猖獗一时。

转引自方兆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面黑旗》，《文汇报》1977年2月14日

社队工业需要发展，要帮助穷队，这都是对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队工业，难道就不能过渡吗？这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张春桥在朱永嘉信上的批示，1976年6月5日

【按】张春桥在这里大讲“穷社”、“穷队”也要“过渡”，没有社办工业也要“过渡”，同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唱反调，张春桥的这种谬论完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宣扬可以离开生产力任意变革生产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

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人，男人女人，男人是女人生的，女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江青在清华大学试化厂的讲话

（二）歪曲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王洪文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

转引自王一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张春桥说：“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

上海市计划组揭发

“四人帮”散布：“宁顺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

摘自出席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发言，《北京日报》1976年12月3日

“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这是“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又一谬论。……他们甚至叫嚷，只要抓好阶级斗争，“工厂可以不出产品”，“农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转引自国家计委大批判组：《“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罪魁祸首》，《红旗》1976年第12期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胡说什么：“一锹一镐不用动，路线解决了，生产就上去了。”

摘自《省直机关干部、群众两万多人集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那个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2日

马天水1971年后多次对上海机床厂干部说：“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的胜利。”又说：“生产上去了，路线不对头，要批评。只要路线对头，即使生产上去也要表扬。”

摘自《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

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自觉节衣缩食，当动员王洪文核减超过标准的粮食定量时，他破口大骂：“这是什么社会？要把人饿死了！”

摘自《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工作座谈会简报》第五期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

1975年第4期

1976年3月4日，在所谓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徐景贤公开说：“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当前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王秀珍接着说：“那天在北京开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的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徐景贤又恶毒地说：“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生产关系是不是也破坏和妨碍了生产力”。

摘自《“四人帮”破坏业余理论队伍是为了篡党夺权》

【按】“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攻击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公然诬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人帮”胡说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转引自国家计委大批判组：《“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罪魁祸首》，《红旗》1976年第12期

“四人帮”胡说：“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

转引自宋华：《“四人帮”“宁要”什么？》，《光明日报》1976年12月12日

对社会主义制度全面专政的总纲（二）

五、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一）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反对和歪曲

在1976年2月，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跑到京西宾馆来，和我以及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人密谈。在密谈时，张春桥大讲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理论，……他说什么：“许多同志的认识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主席两次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这么大的抵抗，可见资产阶级的势力之大。”张春桥还恶狠狠地说：“限制就是限制老爷！”

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的揭发交代

王洪文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到我头上来了！”

摘自上海市《批判“四人帮”文章选辑》

王洪文胡说：“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有资产阶级法权，怎么没有无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法权，我还要搬出钓鱼台了。”

摘自上海市工交组简报

江青大肆挥霍人民的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糜烂颓废的生活，竟恬不知耻地说：“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不算资产阶级法权。”

转引自《“四人帮”是祸国殃民帮复辟倒退帮投降

卖国帮》，《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5日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

1976年第4期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短评：《学习理论，深入批邓》，《学习与批判》

1976年第6期

(二) 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消极作用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巩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

1975年第4期

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按】江青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把社会主义社会还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同旧社会完全等同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存在和不断产生？从经济上说，是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

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1976年第7期

资产阶级法权正是那些要阻止革命前进的人的命根子。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就是这一块资产阶级法权……他们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池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

1976年第8期

(三) 宣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

究竟什么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一九七四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和条件。……

实践告诉我们：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不会有什

么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泾渭分明，不容混淆。限制和消灭，是两个概念。我们所讲的以物质基础为条件的，是指资产阶级法权的最后消亡，而不是指对它的限制。若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今天的限制是为了明天的消亡。

《驳“基础论”》，《人民日报》1976年6月6日

【按】此文得到姚文元的赞许和支持。

六、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把

按劳分配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混为一谈

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

王洪文的一次内部讲话

这些主张复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是反对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群众冲掉的旧规章制度全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等。他们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

摘自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1973年12月20日)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
1975年第4期

【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认为当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情况下，也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张春桥胡说两种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根源，并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五二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按】1953年实行工资制是毛主席肯定的，但指出有缺点。江青把实行工资制说成是毛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的结果，目的是全盘否定通过工资制度贯彻的社会主义

义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遇到大灾，按需分配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

姚文元1975年7月9日在上海的一次谈话

至于所谓按能力强弱，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就是公开宣扬为钞票而劳动，谁劳动得好就钞票拿得多，这是赤裸裸的物质刺激货色，……这种“按功论赏”原来是维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的。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4期

五曰：不能一讲奖励，就是物质刺激。这是他作贼心虚，要搞物质刺激，又怕戴上物质刺激的帽子。其实他讲的那个物质奖励，就是物质刺激，只不过物质刺激实在太臭了，不好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不得不换一个说法。

《评“一切为了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
1976年第2期

……

……

……

……

……

……

七、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歪曲党的经济政策，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

不管用什么办法，增加一块钱产值也是好的。

张春桥1968年在上海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在1968年时，曾经在大、小各次会议上宣扬，上海工业生产为什么能够68年超过66年呢？主要是由于中央各部都瘫痪了。今后各部的机器一开动，上海的日子就要难过了。张春桥在这里，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整个国务院，鼓吹要砸烂一切。

王知常1976年12月17日的揭发交代

张春桥在1968年时，曾经在大、小各次会议上宣扬，上海1967年农业为什么会丰收？就是由于政权机构瘫痪了，无人指挥了，所以农业丰收了。有人管反而是瞎指挥。张春桥以后也曾经反复宣扬这一观点，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村机构都是多余的，有了反而碍事。

王知常1976年12月17日的揭发交代

“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反对“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商品管理体制，胡说按计划统一分配和调拨商品是“搞条条专政”。他们极力煽动大搞产品自销，以物易物，非法协作，冲击有计划的商品流通。他们鼓吹社队工业要“自由恋爱”，自找门路，自由发展，还把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美化为“群众路线”“两条腿走路”，妄图把社队工业引向邪路。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他们避而不谈城乡兼顾，别有用心地把两个“优先”割裂开来。张春桥就曾经叫嚷：“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把工人阶级摆在哪里？”胡说这个原则是“卡”城市、“卡”工人的。

转引自商业部大批判组：《安排好市场，安排好群众生活——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的罪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31日

【按】我们执行的是“城乡兼顾”的方针，“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

“四人帮”破坏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江青曾对基层干部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主席讲要藏粮于民，你们还要交公粮？”……把藏粮于民和粮食征购对立起来，……“四人帮”的爪牙也四出散布什么：“完成征购任务，是为‘走资派’脸上贴金”。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篡改大城市近郊区农业生产以菜为主的方针，破坏蔬菜生产，制造供应上的困难。……他们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把发展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副业生产，斥为资本主义的“聚宝盆”、“摇钱树”。“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竟敢把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恶毒地诬蔑为“杂耍”，真是反动透顶。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还在农村集市贸易问题上大做文章。农村集市贸易，……是现行政策允许的。当然，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代替；条件已经具备了的地方，关闭了是对的。当他们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讲了现阶段经济政策之后，就大批什么“政策允许论”，诬蔑这是“反对革命，反对前进，搞复辟倒退”，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的爪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则疯狂反对副食品进城，攻击收购农副产品是“对农民的变相税收，变相剥削”，是“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恶毒咒骂共产党“是刮民党”，真是反动之极。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江青在七十二天的土改中，还贩卖刘少奇鼓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富农经济”的谬论，拼命鼓吹什么“将来富农经济要发展”，说什么富农是“农业资本家，要巩固，要允许发展，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转引自《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反革命——江青在武昌县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滔天罪行》，《湖北日报》1977年1月19日

【按】江青于1951年10月9日到12月20日，在武昌县参加土改。她猖狂推行刘少奇破坏土改运动、反对依靠贫下中农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八、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一) 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

江青1976年3月3日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天水1976年3月5日在上海机床厂的谈话

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

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农业机械化，是业务部门的事情，市委不要抓。

张春桥1976年12月的一次讲话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根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这篇社论就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并由当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同志审查定稿。但是“四人帮”的姚文元却大唱反调，不经任何调查研究，武断地说什么：“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做到吗？我看做不到，现在不要发这篇社论。”

转引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文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3日

“四人帮”一伙竭力诬蔑搞农业机械化，搞四个现代化是什么“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物质基础”，别有用心地散布“四个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反动谬论。

转引自黄知真：《打倒“四人帮”农业机械化有希望》，《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1日

(二) 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

“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四人帮”在清华的两个心腹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指示，他们造谣说：“这不是毛主席的指示”。

对于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他们竟然攻击说：“在‘一抓三促’的口号下，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如何识别走资派呢？”

转引自清华大学化工系大批判组、校革命家属大批判组：《砸烂“四人帮”的独立王国》，《北京月报》1976年12月4日

今年五、六月间，国务院指示农林部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和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我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重申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强调要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下又捅到他们的痛处。“四人帮”在上海和苏州市的代理人攻击我不能代表党中央，污蔑那次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只知道大干流汗，不知道路线”。

转引自陈永贵：《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4日

去年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以后，煤炭战线学大庆、赶开滦、赶“十面红旗”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对整个工业战线的革命和生产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王张江姚竟然攻击这个会议是“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唯生产力论的会”，污蔑“十面红旗”是“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只不过是多出了几把黑煤面”。王洪文竟破口大骂这个会议报告中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经验是“胡说八道”。姚文元则极力贬低这个会议的重要意义，缩小“十面红旗”的影响，利用他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拒绝刊登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定的《学习十面红旗，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倡议书》，……

转引自《人民日报》短评：《“十面红旗”更加鲜艳》，《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0日

他们大骂铁路工人学理论，促大干，多拉快跑，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革命行动是“唯生产力论”，诬蔑广大职工日夜奋战，确保铁路畅通是“通向资本主义去”。

摘自《打倒“四人帮”多拉快跑——上海铁路局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运输量不断增长》，《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1日

上海的钢铁生产是靠批唯生产力论上去的。

马天水1975年的一次讲话

(三) 煽动罢工，停产，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妄图乱中夺权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召见我厂干部和工人代表时，居心险恶地说：“我要是工人，我也不上班，因为要复辟资本主义嘛”。

转引自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大批判组：《王洪文破坏团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铁证》，《新疆日报》1977年1月30日

王洪文他们曾经恶狠狠地说：“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哪里形势就不好”，“搞垮一个厂子，就是在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

摘自《粉碎“四人帮”，浙江有希望》，《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4日

江青到我们厂公然煽动罢工、停产。说什么“那种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了，你还不罢工，不贴大字报？”

摘自《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江青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反革命言行》，《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9日

“四人帮”说：“不要怕把生产搞下去，不要怕把形势搞乱，生产下去了，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

转引自张振财：《打倒“四人帮”，大干社会主义无阻挡》，《甘肃日报》1976年11月16日

唐岐山诬蔑大干社会主义的工人是“只会干，不管钱”，“干劲越大，罪恶越大”，“大干大修，小干小修，不干就是反修”。

摘自《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工作座谈会简报》第七期

(四) 反对毛主席要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

张春桥胡说什么：“八亿人民主要抓上层建筑，生活苦点不要紧。”

转引自春荣：《“小事”“大事”议》，《解放日报》1977年1月21日

张春桥多次向人兜售……“革命搞好了，八亿人民生活再苦也没关系”。

转引自任捷：《“谋道不谋食”的翻版》，《解放日报》1977年1月20日

“四人帮”叫嚷：“整个唐山才一百万人口，全国有八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

转引自新华社记者：《破坏抗震救灾十恶不赦》，《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2日

今年八月，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后，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紧急动员和部署生产支援抗震救灾的物品。可是“四人帮”不顾人民的死活，叫嚷：“要用罢工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抗震救灾”。

转引自新华社记者：《中原大地风雷吼》，《人民日报》1976年12月7日

九、妄图砍掉大庆、大寨两面红旗

学大庆，有右的干扰，有人完全否定，后来又有极“左”干扰，夹进各种各样的私货，现在学大庆被极“左”的和极右的干扰搞糊涂了。

张春桥1971年11月28日在上海市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在1974年10月竟说：“大庆是管、卡、压的典型，是唯生产力论的样板”。“毛主席过去树他们，是创业阶段，现在他们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批条条专政，批唯生产力论。”

“四人帮”胡说：“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不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要“彻底批判大庆道路”。

转引自中共大庆委员会：《红心向着华主席，彻底砸烂“四人帮”》，《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23日

张春桥胡说：“学大庆究竟怎么样？这件事我有些怀疑”，“我看大庆人也被人家弄得糊里糊涂”。……王洪文等还叫嚷：“大庆是一个点，上海是一个面”，我们要总结上海一套完整经验”。梦想把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庆这面红旗砍倒，扼杀毛主席亲自倡导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搞一个什么“工业学上海”。

转引自王一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一伙反大庆、砍红旗的手段之一，就是砍红旗先拔根。……反党分子江青嚎叫“大庆‘两论’起家是真的，不符合事实。”“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也恶狠狠地说：“什么‘两论’起家，毛主席的论多着哩！”“工业学大庆，主要学创业那一段，现在大庆是生产典型，搞资产阶级管、卡、压。”

“四人帮”反大庆、砍红旗的手段之二，就是砍旗先反护旗人。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大庆红旗热情扶植，加倍爱护，……“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特别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总理。他们追查油田会战初期党中央给大庆工人送“两论”的“背景”，攻击大庆坚持亦工亦农道路是“搞假共产主义”，追查大庆化肥厂是谁批准建设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去年九月，……“四人帮”又狂叫“大庆是那个司令部搞出来的”，妄图把周总理打入资产阶级司令部，……

“四人帮”反大庆、砍红旗的手段之三，就是砍旗先砍扛旗人。……张春桥则恶毒诬蔑王进喜同志，贬低以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说什么“大庆糊里糊涂”，王铁人“表现的

很不好”，“要走向他的反面”，“是既得利益者”，“没有什么革命的要求了”。

“四人帮”反大庆、砍红旗的手段之四，就是疯狂地压制封锁大庆。大庆队里屯“大化”建设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建设的。今年二月，正当“大化”建设进入紧张施工阶段，“白骨精”江青竟下令追查“大化”究竟是谁批准的？”她还在一个简报上横加批注，胡说什么“只知建‘大化’，不知其危害。”

摘自《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简报》，黑龙江省（1976年12月13日）

“四人帮”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转引自陈永贵：《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4日

“四人帮”胡说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是“宣扬唯生产力论的”。……张春桥胡说：“大寨是劈山造田，我们上海无山可劈。”今年九月，江青窜到大寨，诬蔑大寨“执行了修正主义指示”，“骄傲自满”，“政治上落后”。

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四人帮”却说：“提款、懒、散没有阶级分析”，“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说“整顿就是复辟”。

转引自农林部大批判组：《农业学大寨的革命洪流不可阻挡》，《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1日

对大寨，他们也是恶毒攻击，说什么：“我是看不起大寨的”，公然反对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指示。张春桥多次说：“自己搞嘛，为什么要学人家的？”

转引自王一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攻击大寨，首先是千方百计歪曲和否定大寨的根本经验，把大寨贬低为一个生产典型。张春桥及其亲信说过，“深挖沟，广积肥，园田化，就是学大寨。”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的所谓“评水浒”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攻击大寨不学理论。姚文元也胡说：在当前学大寨运动中“不研究农村工作如何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研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不研究毛主席作了多次指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这是对大寨大队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极大诬蔑。

转引自农林部大批判组：《围绕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两条路线斗争》，《红旗》1977年第1期

1975年10月1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未结束，王洪文就窜到青浦县徐泾公社，大

谈“过渡”问题，并搞不搞“过渡”说成是“不想搞革命”。“四人帮”的黑爪牙朱永嘉多次把“过渡”说成是同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所有制方面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农村生产的一次革命”。他们就是要另搞一套，以“过渡”来代替和取消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上海师大原“过渡”工作联络组揭发

农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上海不能落在后面。过渡问题被邓小平搁下来了，现在我们要抓。

张春桥1976年5月3日对上海市委负责人的谈话

朱永嘉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在1976年6月，指令师大、复旦师生下乡搞“过渡”调查。他说：“半年以后要出一本调查报告集子，要象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时所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样，要送中央领导同志加上序言和按语。”还说什么：“这次过渡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变动，总结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运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这次要抓得早。”朱永嘉在1976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还说：“过渡工作的声势肯定要比当年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还要大，因此，出这本调查集对于指导全国农村所有制变更的运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朱永嘉到北京参加毛主席逝世吊唁活动回来后，迫不及待地要在10月15日前出调查报告集的第一辑，……他说：“序言的口气要大，能讲出哲理来更好，……”

上海师大原“过渡”工作联络组揭发

十、反对“鞍钢宪法”篡改

无产阶级办企业的路线

(一) 反对“鞍钢宪法”，否定企业管理

王洪文说：“‘鞍钢宪法’这个东西，还是放到政治夜校里去学吧！”张春桥、姚文元鼓吹“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讲相互关系”，妄想用他们的这个所谓“企业三讲”来取消“鞍钢宪法”。

转引自王一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王洪文不准上棉十七厂党委学习“鞍钢宪法”，还胡说“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狂妄宣称他要好好摸索。

摘自《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工作座谈会简报》第5期

上海工人的心情比较舒畅，多数人。所以你不要管理工作（也）可以做。

张春桥1976年在上海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6年7月2日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对党委常委说：“社教就叫管理，没有别的管理。凡是搞什么多少条多少条的，不管几条都是不对的”。

上海机床厂揭发

黄涛说：“机器一转动，就有管理，你们不要去抓”。

上海市工交组揭发

(二) 反对企业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指标，打着

批判“利润挂帅”的幌子，否定经济核算

的必要性

桥张春要上海的国营农场“闯出一条路子”，“要做出个样子”，“给全国提出一个希望”。是什么样子呢？他又说：“办农场嘛，不能讲赚钱，要讲路线，不能讲钞票，不能讲成本”。

摘自《前进农场宣言是反革命的宣言书》，《文汇报》1977年1月16日

唐岐山胡说：“抓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

摘自《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工作座谈会简报》第7期

1975年马天水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求全面完成产量、品种、质量、消耗、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凭我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摘自《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七

“四人帮”胡说：“利润越低越好”，“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

转引自贵州柴油机厂工人理论组：《搞好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贵州日报》1976年11月26日

（三）反对建立社会主义规章制度

王洪文说：“国务院务虚会议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黄涛1976年11月18日的交代，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张春桥胡说：“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要建立规章制度。”

摘自《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1972年10月，张春桥陪田中角荣来滬，在滬逗留期间，……找了朱永嘉、肖木、我和顾澄海四个人去。张春桥说铁道部在搞规章制度的试验，是在回到老路上去。他又说一机部在辽宁搞规章制度的试验，其实是在搞物质刺激，也是有走老路的危险。他又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疲劳的是积极分子。

王知常1976年12月17日的揭发交代

一九七二年，中央台在《对工人广播节目》的方针里提出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姚文元大笔一挥，删去了。从此，“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在广播和报刊里消失了。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977年1月14日

“四人帮”破坏商业企业管理，反对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把加强企业管理，建

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诬蔑为“管、卡、压、”，“搞资产阶级专政”；把加强经济核算，增加积累，诬蔑为“利润挂帅”。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打着加强政治工作的幌子，鼓吹什么“我们能不能搞不靠规章制度，而靠政治工作办企业的经验？！”马天水、黄涛也跟着攻击说：“强调岗位责任制是修正主义”，妄图全盘否定合理的规章制度。

转引自范子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姚文元还提出：“上海要搞一些不用规章制度管理的工厂企业”。

上海五金交电公司螺丝商店揭发

过去资本家法律那么多，也管不住，宋朝法律多，农民起义的那么多。

马天水1975年9月11日召集上钢五厂等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说：“搞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

转引自《上海国棉33厂坚持学大庆狠斗“四人帮”》，《文汇报》1977年1月19日

“四人帮”诬蔑大庆的“三老四严”是“奴隶主义”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枷锁”；严细作风是“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攻击大庆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束缚群众的手脚”；攻击岗位责任制是“诱骗工人只要守住‘一个岗位’”，“把工人的积极性卡死在专职分工的框框里，变成分工的奴隶”。

转引自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两论起家”的新胜利》《北京日报》

1977年1月31日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到我厂说：“岗位责任制只能起限制作用，把人限制了，后退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路线不对头，也会变成管卡压”。

转引自上钢五厂生产指挥部：《批“唯生产力论”是假，破坏生产是真》，《解放日报》1977年2月3日

十一、反对毛主席“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反对党的 对外贸易政策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在外贸问题上大作文章，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作为他们攻击的一个重点。他们……诬蔑外贸“确实是有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全盘否定外贸工作。

重要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是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的，有些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同意的，是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四人帮”明明知道这些情况，而且他们自己也曾划圈同意过的，但是却恶意攻击“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周总理，指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有计划地出口一些石油、煤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不但是为了换取外汇，更重要的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配合外交斗争，……“四人帮”却把出口石油、煤炭诬蔑为“出卖国家资源”、“卖国”，……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统制对外贸易的根本政策，破坏统一对外。他们大骂外贸搞“垄断”，叫嚷“要革垄断的命”。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夺党中央、国务院对外贸工作的领导权，把外贸抓到他们手里，由他们“四人帮”来垄断我们的对外贸易，……

摘自李强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七六年三月间，大野心家江青在一次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召开的会议上，公然捏造我国的石油“都拿给外国去了”，“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恶毒攻击“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有“买办资产阶级”。

摘自新华社记者：《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揭露“四人帮”在外贸事业上猖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恶毒攻击周总理的滔天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1月14日

“四人帮”攻击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外贸部为“卖国部”……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到六月之间中央召开的三次会议上，……王洪文破口大骂“外贸部门有一批卖国主义的人”。张春桥露骨地恶毒攻击说：“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攻击我国“是殖民地经济”。江青信口胡说“我国出口石油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姚文元公然造谣说，国务院把资源“租让给外国”，搞“卖国主义”。

摘自李强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我国在1972、1973年，经毛主席圈定、周总理同意，先后向国外进口二十三套大型成套设备，朱永嘉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他却说什么：“引进技术也有个路线问题，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还是可以的。”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摘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是怎样利用经济调查进行反党的？》

朱永嘉胡说：“上海十三个进出口公司就是广州十三行，都是搞洋奴买办的资产阶级”，“外贸部就是洋奴买办部”，“那里的头头实际上就是洋奴买办资产阶级”。

摘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是怎样利用经济调查进行反党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

方海：《批判洋奴哲学》，《红旗》1976年第4期

【按】“四人帮”用造谣诬蔑的卑劣手法，攻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我党的对外贸易政策。